

292.35/2

《范振美》丛书

唐玄序集王羲之書金剛經

上海博物館藏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22166755

徐州师范专科学校



1985.6.24



图书馆藏书

058202

前言

中国书法艺术的演变发展到行书型式时期，形成新的面貌。东晋时代，王羲之（三二一——三七九）又在行书艺术上加以变革，成为一种「如斜反正，若断还连」的「新体」，涌现出异彩妙趣，赢得社会的承认、爱好和流行，给后来的书法艺术开辟了新境，并沾溉于无尽。

唐太宗李世民（五九九——六四九），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他以帝王之力，大事收罗羲之墨迹，集中丰富了唐王朝内府的收藏。特别撰著了《王羲之传论》，甚至要把羲之《兰亭序》真迹殉葬他的坟墓——昭陵。他自己能书，提倡王字，锐意临习，并且首先开创了运用行书上石刻碑。他写的《温泉铭》、敦煌石室出唐拓本，有罗振玉影印《墨林星凤》本和文明书局影印本）、《晋祠铭》（有流传拓本和日本影印本，并有原石未磨本），确实是羲之书体的嫡系。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六二八——六八三），也是承遵他父亲的道路，勤于临学，写过几种碑，如《万年宫铭》、有传拓本和日本影印本）和《英贞武公李勣碑》、有传拓本和爱俚园影印本）等，正象羲之、献之的家法相仿。由于帝王既好于上，臣民便效于下，当时的书法艺术竟以王字为典范，风靡天下。因之，由临摹书写移植到集字刻石的风气，盛行于世。

自唐高宗李治咸亨三年（六七二）长安弘福寺僧怀仁集王羲之书为《圣教序》以后，集王字刻石，为数颇多。由于书法艺术水平的关系，刻石匠师刀法技术的高下，在今传世拓本看来，其间优劣差距较大。

上海博物馆所藏宋拓本明末两面装裱册《新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杨颢删缀。唐玄序集王羲之书。邵建刻。大和六年（八三二）立石。为传世集王字诸石刻中字数最多之本。

《金刚经》集王字石刻本，迭经著录，见于北宋欧阳棐《集古录目》卷九（《云自在龕丛书》本），赵明诚《金石录》卷十（《四部丛刊续编》本），南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八（《十万卷楼丛书》本），清初钱谦益《有学集》卷四十六（《四部丛刊初编》本），以至于清末叶昌炽《语石》卷八（清宣统元年长洲叶氏刻本），但都是写成唐唐玄度集，而不及唐玄序名。只有清初叶奕苞《金石录补》卷二十

（《行素草堂金石丛书》本），是著录玄序名的。按覈石刻本，唐玄度只是篆额而已，唐玄序才是实际模集者。按唐玄序里籍生卒不详，事迹无传，现在只知道他的仕履是朝请郎前右卫仓曹参军，是个小官吏，可能和唐玄度是兄弟辈行，唐玄度的官衔是翰林待诏朝议郎行楚州司兵参军上柱国赐绯鱼袋，比起玄序来，要显贵得多，并且著作过《九经字样》一书（刻本颇多），有《小学汇函》、《后知不足斋丛书》等本），是个小学家。因此一般著录，大都以他为主，而使唐玄序的姓名湮蔽无闻。这种情况，过去在目录学、金石学方面，往往会遭遇到的。

《金刚经》这一重要佛教经典，前后六译，各有异同。杨颢又取而排纂删缀，名为《新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原经文五千一百六十七字，杨本仅四千四百五十六字，删去了中间大段经文。成于大和元年（八二七），杨颢自撰序。翰林诸学士郑覃、王源中、许康佐、路群、宋申锡、崔郸、李让夷、柳公权为作经赞。大和四年（八三〇）奉宣上进新刻碑本，由特进行右威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臣杨承和状进。其状略云：「搜诸异义，一贯群宗。为龕愚却妄之程，岂上达不刊之法。臣慙为小善，遂刻私名。伏奉恩华，不敢追改。」据状，知杨颢即承和的私名，唐代仕宦，往往有官名和私名的分别称用。这里的杨承和在佛教活动方面，用的乃是私名。杨颢删缀《金刚经》的意图是不小的，经序中略谓：「金刚前后六译，贝叶皆自西来，而五尺音韵非一。……如小失佛心，即大讹秘印。今合诸家之说，择言寡而理长，语近而意远者。……」观此，可见他非常自负，认姚秦以下的旧译，都有问题，必须重行排纂删缀的。对《金刚经》用自己的意旨来加以刊定，宋人孙知县及龙舒王日休已经有过这种举动，受到了佛教徒们的弹驳，有「招因带果，毁谤圣教」的呵斥，而唐人却已先有之。但在当时翰林学士们的许多经赞中间，柳公权的一赞，是值得注意的，谓为：「揣摩一经，前后六译，今之而七，毕竟斯获。」似乎已经明说六译不容许有七，只是稍稍隐约其词而已。佛教经典，在唐代佛教徒的师心删略，标新立异，号称「新集」，已经是走向支流纷杂的地步。而「新集」奉宣上进后，却得到文宗李昂的重视，这年八月，奉敕并下左右街功德使，令编入《藏经目录》讫。其石经在上都（唐长安，今西安市）兴唐寺中安立。初刻是八分书体，读

者多误，因改为集王羲之书，重刻上石，至大和六年（八三二）春功毕。

这一宋拓本，墨气苍润，锋棱宛在，足为拓时较早的明证。《圣教序》千余言，怀仁集字，未免凑合。而《金剛经》由于梵字太多的关系，假借补缺颇少，明陈继儒的跋语，是比较中肯的。但集王之字，当时称之为「小王书」，这个名称就是说这些字不尽出于羲之，所以名「小王书」。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模集人唐玄序书法修养的表现程度，是尽可以和怀仁相媲美，而刻石匠师邵建的刀法技术，也可以同《圣教序》镌字者朱静藏相伯仲，这应该以艺术水平来衡量了。

关于刻石匠师邵建的姓名，存在一个问题，即见于柳公权书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的最后，有会昌元年（八四一）「刻玉册官邵建和并弟建初镌」的题名，又裴休书《圭峰定慧禅师碑》有大中九年（八五五）「镌玉册官邵建初刻字」的题名，而这本《金剛经》的最后题名为「将仕郎试太常寺奉礼郎上骑都尉邵建刻」，建字左边，原拓本因有石花，不甚清晰，但根据字数部位的排列，似乎只可能是单名的（建字下的一字当是刻字尚可辨）。叶奕苞《金石录补》著录，亦作邵建。如果以这些碑版参证，那末是邵建，还是邵建和或是邵建初，就难以肯定了。大和六年至会昌元年，中间隔了九年（大中九年距离更远），邵建升调为刻玉册官，增添名字，也有可能。看来姓邵的石师，是那时的名手，这是毋庸置疑的。

王羲之书法墨迹流传下来的，都是唐以前或唐人摹本，石刻集字，当然不能例外，但字迹彼此相较，还是可以取资观摩的。《金剛经》存字有四千四百多，能够较多地保存王字风貌，足以丰富羲之书体领域，无疑地将是有助于行书艺术的研究和学习。

《唐玄序集王羲之书金剛经》，拓本流传极罕。此本在明末装裱时，颇有错裁、误接之处，现在已作了校订改正。除此本外，另有一宋拓本（清康熙商邱宋荦旧藏），今藏于故宫博物院。

沈宗威

一九八二年五月

金剛經序

弘明楊顓述

金剛經前後六譯名目異
同然見葉皆自西來五
天音韻雖一傳授者所貴

道存廢貶義切鎗銖如小
失佛心即大訛秘印今合
法家之說擇言實而理長
語近而意遠者即當纂集
次如來演教本為大乘之

人中下杯疑間法不能曉
了或立無破有或取實指
空乎馳妄車背跡中道留
不知有為者是無為之體
無為者是有為之用若以

有實有此見未常以無實
無此心斷滅矣真如之理
都在有法無法之間證現
涅槃不離妄相實相之內
似考擊金石知群動之風

者聲本乎樂而應在音此
樂不能流其聲此聲不能
振其音此音不能顯其樂
音之者入耳不知所自無
象而感人心求之於樂無

聲何以審音求之於聲而無
樂聲何以有善趣其用者
不可捨其聲不可捨其樂
善得其理者不可取其聲
不可取其樂今者以樂比

法教以聲身同修行以音喻
佛性如光燄合體明在其
中絕燄求光明不可得即
老聖者無相生我佛此法
非非法之義也是故今切

者物證理者心心昧即物
無所歸物昧即心無所守
是以心因法悟離法而存
心佛在法中有法而非佛
諸入菩薩乘者但勤修一

切善法於此見中而不取
相即合無生寂止之理顯
速夫也小渚傾襟豈陶塵
或衆源潤想方洗繁疑燃
八閭之寶燈猶在領之多

價所與子為己不旦教人時
大和元年也

新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
國祇樹給孤獨園與諸大

菩薩及比丘衆千二百五
十人俱尔時世尊日初分
整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
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
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

足已敷座而坐結跏端身
正念不動時諸比丘來詣
佛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
退坐一面長老須菩提在
大眾中承佛威力即從座